

中国的国际关系 与国际政治研究新趋势

吕耀东 谢若初

[内容提要] 随着中国广泛参与国际事务，国际关系与国际政治的理论与实践问题要求相关研究与之相适应；同时国际社会也希望听到中国的声音，因此中国有责任在国际关系与国际政治研究中提出自己的理念与构想。中国不仅掌握了西方国际关系与国际政治研究方法及相关理论，并对其运用、实践乃至拓展，且尝试以新的视角与思维方式，结合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及近现代国际关系的实践经验，在国际关系与国际政治研究的中国化、范式与路径，核心概念的创造、创新及理论性突破与拓展等层面，不断发出学术探索的声音，并在基础理论、现实应用及对策研究等方面取得了可观的学术成绩。

[关键词] 国际关系理论 国际政治理论 范式 创新 拓展

[作者简介] 吕耀东，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和平与发展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谢若初，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

[中图分类号] D8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6241(2016)05-0094-20

国际关系与国际政治研究的对象是纷繁复杂的国际社会，是人类跨越国家界限进行的各种活动。具体而言是国际社会运行和国际行为体之间互动关系及其发展变化的规律性研究。中国的国际关系与国际政治研究已经经历了 50 多年的探索历程，取得了相当的成绩。在几代学者的

努力之下，中国不仅掌握了以西方学者为主建立的国际关系与国际政治研究方法及相关理论，并对其进行了运用、实践乃至拓展；而且开始不断尝试提出新的视角与思维方式，结合中国悠久的历史传统文化传统及近代以来的实践经验，在国际关系与国际政治研究中发出自己的声音。

一、范式与路径：国际关系与国际政治研究的中国化进展

从国际关系与国际政治研究的发展轨迹来看，随着国际环境发展变化的日趋复杂，以及学界对于国际关系与国际政治研究的不断深化，人们对于传统意义上的追求单一范式的研究理念已经有了很大转变，研究中理论的多样性趋势日渐明显。但毋庸置疑的是，以三大主义为代表的国际关系理论仍是学科的重要支柱，很多研究仍围绕其展开。从某种角度上看，国际关系与国际政治研究路径与范式的中国化发展，就是在不断变化着的国际环境下，对三大主义的定义完善与内涵丰富。

同时我们也应当注意到，当今国际关系与国际政治研究的主要范式和路径源于西方国家，是西方文明的综合性产物。随着中国的不断发展及在国际事务中地位的不断提升，世界希望听到在国际关系与国际政治研究中的中国声音；中国也有责任、有自信在国际关系与国际政治研究中提出自己的理念与构想。

（一）过程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新变化

“过程建构主义”是秦亚青于2012年提出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其理论在建构主义的基础之上，将“过程和关系”这两个中国社会文化理念植入其中，注重国际关系变化过程中的关系互动及对国际关系的社会性解释。具体来讲，该理论采纳建构主义基本假设和分析架构，吸收了社会学关于社会关系的论述，内含要素则是中国“关系性”的核心理念，即过程中的关系和关系中的行为体。^[1]

[1] 秦亚青：《关系本位与过程建构：将中国理念植入国际关系理论》，载《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

作为过程建构主义理论的实际运用之作，莫盛凯在《权力转移与预防性合作》一文中以中美关系为分析对象，强调在权力转移发生时，应当运用过程建构主义的思维方法，注重中美两国关系发展的过程，通过采取预防性合作的方式，最大程度避免冲突的发生。同时，过程建构主义也可以被视为建设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理论支撑。^[1]应当说，该论文是将过程建构主义理论运用于分析现实问题的有益尝试，也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了有益参考，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从研究对象上讲，近年来在中国快速发展和美国“重返亚太”的大背景下，中美关系已经成为全球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受到世界各国政要及学界的高度关注，具有较高的研究关注度。

其次，从过程建构主义理论本身来看，它解决了以往学术界在权力转移研究过程上的空白。即以往的研究理论只能静态地解释权力转移的结果及构造性原因，忽视了其发生过程中的动态性变化和可控性。而根据过程建构主义理论，构建中美间的预防性合作机制，正是抓住了这一研究的真空领域，着眼于中美两国关系发展的过程；从而在形成不可逆结果之前力求缓和，甚至解决权力转移过程中的中美两国在各个领域上的可能性冲突。

最后，从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研究的中国化发展上看，中国和平发展的理念与传统的崛起国取代目前强国的西方传统理论存在一定出入，西方理论已经无法全面诠释中国的和平发展战略，需要中国学者以适当的方式加以说明。而说明的前提就是提出适当的方法性理论；过程建构主义正是这样的产物。最为重要的是，将过程建构主义理论运用于分析当前最重大的国际现实问题，表明了中国学者有能力丰富、提升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研究的路径与范式；中国化的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理论在吸取中国传统文化之后，焕发出新的活力并完全可以解决西方单一文化背景下产生的理论方法无法解决的问题。可以预见的是，过程建构主义将更多运用于解决权力转移理论下的双边甚至多边关系，弥补原有研究

[1]莫盛凯《权力转移与预防性合作》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2期。

理论的空白，更加重视过程与关系，防微杜渐，从而尝试解决一系列更复杂、更多元的实际问题。

（二）道义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新框架

“道义现实主义”属于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的范畴，是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副教授张峰于2012年提出的一个概念。该理论将西方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同中国的传统道义观相结合，试图提供一种阐释国际关系，尤其是权力转移理论的新视角。具体来讲，道义现实主义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崛起国是如何取代现行世界主导国的地位，即主导国会失去主导地位的原因以及相应的国际体系变化的可能性与必然性的新趋势。

阎学通教授在《道义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一文中，提出了将国家实力分为“主导国”、“崛起国”、“地区大国”、“小国”四类；政治领导分为“无为”、“守成”、“进取”和“争斗”四类的新框架结构。并在此基础上做出深入分析，认为道义现实主义不是从如何维持霸权，而是从如何取代霸权的角度进行研究；进而提出中国外交战略调整的深化，应着眼于两个主要方面：即推行“公平、正义、文明”的价值观和建立德威并重的战略信誉，丰富“亲、诚、惠、容”等奋发有为的外交政策。^[1]

该论文无论是在促使道义现实主义这一新兴理论的发展方面，还是在推动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研究范式路径的中国化进程方面，都堪称佳作：一是该论文通过缜密的分析反驳了现实主义其他流派学者对于道义的误解，阐释了道义同现实主义框架下其他主要概念之间如实力、权力的关系；并以现实主义视角分析了道义与国际权力、国际权威的关系，从而排除了道义同现实主义相结合的障碍，夯实了“道义现实主义”的基础。二是该论文以现实主义基本理论为基础，通过进一步推论，证明了道义现实主义的科学性。具体来说，通过推论认定道义在国家行为和国际规范演化、无序体中不同国家的安全自保战略、崛起国与主导国关系、政治实力变化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三是在于运用道义现实主义理论，解释了权力转移现象背后的共性逻辑（也是该论文的最大意义）：

[1] 阎学通：《道义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载《国际问题研究》2014年第5期。

即在权力转移发生之时，崛起国在弱势情况下取代主导国的重要原因，在于其政治领导力强于后者；而政治领导力取决于政治领导的类型。为此，作者首先通过将国家实力及政治领导进行分类，进一步推出了不同情况下（国家实力与政治领导类型的不同组合）一国的战略选择类型。然后将战略信誉引入分析之中，阐述了其与国际秩序之间的关系。最后作者得出结论：只有在国家实力和政治领导类型相匹配时，才有可能讲求道义和战略信誉，进而发生权力转移。可以说，这篇论文不仅对中国和平发展战略做出了合理的理论阐释，而且也通过对道义现实主义理论的进一步完善，为现实主义理论研究开辟了新方向。

（三）国际关系归因理论的内外维度的作用

归因理论原本属于人力资源管理和社会心理学的范畴。后来由美国学者罗伯斯·杰维斯将其引入到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

《一个新的国际关系归因理论——不确定性的维度及其认知挑战》的作者唐世平在该文中以四个内部维度（即能力、意图、利益和决心）及一个外部维度（即外部环境）为基础，通过分析不确定性在不同维度可能带来的误差，为进一步全面理解国家在合作或冲突情景中的行为提供了可能。同时，也以此向结构主义的正统地位提出了挑战。^[1]这是中国学者在运用社会心理学归因理论解决国际关系问题时所作的一次大胆尝试。作者对归因理论在国际关系领域的运用做出了贡献：归因理论作为被引入到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外来理论，不仅需要根据该领域的特点做出相应调整，其理论本身也需要进一步完善。作者试图建立一种适合国际关系研究的归因理论体系。可以说，唐世平的这篇文章为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研究又加入了新的研究范式和路径，是中国学者在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研究中国化进展中的又一次有益尝试。值得注意的是，这篇文章还反映出社会科学研究的一大趋势：即跨学科理论的相互借用及反哺。

（四）核心概念创造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发展

核心概念创造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发展这一议题随着中国国际关系

[1] 唐世平：《一个新的国际关系归因理论——不确定性的维度及其认知挑战》，载《国际安全研究》2014年第2期。

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和探讨。在其核心概念创造方面，许多学者亦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2013年12月，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研究》编辑部就以“核心概念的创造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为主题召开研讨会。同时，《国际政治研究》期刊也曾以专题的形式对会议成果进行集中刊载。其刊载的4篇论文的观点虽不完全一致，但都从学科基础和方法论的角度为推动中国国内有关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做出了努力。宋伟在《国际结构与国际格局：核心概念的比较与启示》一文中通过评估认为，肯尼斯·沃尔兹所提出的国际结构概念符合方法论要求，即具有内涵清晰、易于研究、独立性较强、具有稳定性、不是完全常量等特点。相比较而言，中国学者经常使用的国际格局概念则内涵较为混杂，可分为等同于国际结构概念、基本等同于国际结构概念、涵盖能力分配和战略关系、更偏重于国际秩序等四个方面。他认为，就现阶段而言，与其使用因加入诸多不必要因素而影响其运用的国际格局概念，不如使用较为清晰、成熟的国际结构概念。^[1]该文通过具体概念的比较研究，指出了中国学界目前在核心概念运用与创造方面的不足之处，值得深思。

《国际舞台上的中国角色与中国学者的理论契机》一文的作者李巍、唐健先从历史角度探究了中国未能建构国际关系理论的原因主要有二：1. 近百年的历史变迁使得中国的国际地位不断变化，影响了相关定位与研究；2. 中国长期与西方国际体系或隔绝孤立或为配角，不利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建构。随后，作者结合中国当前政治大国、经济大国、文化大国的国际地位及地缘优势，指出，当前正是中国学者进行国际关系理论建构的有利时机。可以说该文对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环境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值得借鉴。

董青岭在其《从中西哲学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创生》一文中指出：如果“二元分立”哲学和牛顿世界观可以滋生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群，那么在“二元互补”哲学与“过程演化”世界观的指导下，中国本土哲

[1] 宋伟：《国际结构与国际格局：核心概念的比较与启示》，载《国际政治研究》2014年第4期。

学也可以产生出具有本土特色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该文从哲学角度阐明了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可能性，是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哲学依据。

刘丰在《概念生成与国际关系理论创新》一文指出，中国经验和中国概念在丰富国际关系理论体系方面具有很大潜力；可以修正根植于西方经验的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不足，进而提出中国概念的发展和植入需要遵循的概念创新和理论创新的基本原则。在强调中国经验和传统文化特殊性的同时，也应注重社会科学知识的普遍性和共通性，从而使中国概念能具有更加广泛的运用空间。该文为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概念生成及理论创新提供了有益的方法论建议。

二、深化与发展：国际政治中战略研究的议题拓展

战略研究一直以来是传统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研究的一个重点领域；其依据不同的研究路径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一直以来西方的战略研究与心理学研究结合的较为紧密，中国的战略研究则以宏观战略研究为主。

（一）战略与心理学关系的前沿研究及探索

郝拓德和庄嘉颖在《反复性紧张局势的后果研究》一文中以东亚安全中的四对双边危机为案例，讨论它们对于双边及东亚安全局势的战略性质后果。作者将国际关系中情感要素研究的最新成果加入到分析反复性紧张局势的后果当中，认为重复且尚未解决的一系列紧张事件，应该被视为一种相互承接的过程，即前一事件会成为后一事件发生的背景并长期积累。紧张事件的不断累加会造成一国领导人和大众心理的变化，从而使得矛盾愈加激烈，甚至走向极端，形成积重难返之势。这种结合心理学的阐释手法，有助于解释双边层面下许多历史遗留问题或固有争端不仅长时间得不到解决，甚至愈演愈烈的疑难问题。^[1]此外，在《诚意

[1] 郝拓德，庄嘉颖：《反复性紧张局势的后果研究》，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9期。

信号表达与中国外交的战略匹配》一文中，尹继武从政策宣示、行为约束角度总结了冷战后中国对外关系中的诚意信号表达的渠道和基本事实，以及影响表达的一些基本要素。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了一种战略匹配影响诚意信号表达的初步框架。^[1] 他的另一篇论文《中国外交转型的微观社会互动分析》则从社会认同的角度分析中国在实现外交三个目标维度（权力、地位、价值）的转型过程中所需注意的问题。^[2]

（二）传统战略命题变化的环境因素及动因

国际战略格局与环境无时无刻不在发生变化。尤其是随着冷战结束，新的战略格局环境已经形成，传统战略命题必然受到这一影响并随之发生变化。任琳在《网络空间战略互动与决策逻辑》一文中结合网络空间的新特点，分析了传统战略中的互动，指出了造成这些影响的原因及可能产生的结果，并提出了在网络空间主导的新环境下，国家在制定战略过程中的关键所在。^[3] 凌胜利则将一些传统的战略命题“搬”上了太空舞台，认为太空治理议题涉及太空资源利用、太空环境治理、太空安全以及太空安全化四大问题。新的太空制度构建需考虑太空领域的权力结构、博弈类型、议题差异等因素。文章建议以分层治理模式治理太空；中国应在其中发挥身为太空大国的作用。^[4]

（三）战略研究的理论性命题导向和战略互动分析

在战略研究的理论性命题导向上或者在经典的战略研究命题上运用新的案例，或者是结合新的议题或经验进行研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海洋战略的研究成为了战略研究的重点。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了“建设海洋强国”的战略目标。这激发了学界对海洋战略研究的热情，产生了一系列成果。其中，刘新华借鉴战略管理中的SWOT分析法，即“优势—劣势—机会—威胁”模型，通过对中国发展海权所处环境等一系列因素的分析判断，明确了中国发展海权内部条件

[1] 尹继武：《诚意信号表达与中国外交的战略匹配》，载《外交评论》2015年第3期。

[2] 尹继武：《中国外交转型的微观社会互动分析》，载《教学与研究》2015年第5期。

[3] 任琳：《网络空间战略互动与决策逻辑》，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11期。

[4] 凌胜利：《太空治理与中国的参与战略》，载《国际问题研究》2015年第3期。

的优势和劣势、外部环境的机会和威胁及其关键因素。^[1]同时,也有众多学者研究了具体对象国的海洋战略及其与中国在海洋战略上的互动。

在战略动员和战略手段研究方面,左希迎在《中国在钓鱼岛争端中的战略动员》一文中以钓鱼岛争端和危机为案例,解析了中国的战略动员机制,战略动员的三个动力因素(日本施加的外部压力、中国国内民众压力、积极有为的领导人)以及三种战略动员手段(大众动员、资源汲取与投送、制度整合)。^[2]还有一些学者进行了纯粹的国家或区域的战略互动分析。由于成果十分丰厚,在此恕不一一列举。

从近年来学界战略研究的理论性命题导向和战略互动分析来看,总体上遵循了两个原则:一是紧跟国家发展战略布局规划展开相关研究;二是密切结合国际战略局势变化进行有的放矢的研究。可以说,中国在战略研究上的新趋势就是研究中国国家战略的新规划和国际战略的新动向。

三、拓展与创新:外交研究的全方位视角及议题深化

中国外交研究一直以来都较为重视宏观研究,尤其是从国际体系的结构变化,行为体力量对比变化等大视角出发进行研究。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学界历来重视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整体性、联系性研究;另一方面则是受限于命题本身较为宏大、材料的政治敏感度等客观因素。近年来,微观视角下的外交研究逐渐增多,外交史和思想史研究也逐步展开,特别是外交研究的议题和领域在不断扩展深化。

(一) 外交研究议题及领域的深化

学界的主权争端研究在外交局势的影响下继续深入。杨昊、蔡拓的《公地化:解决领土主权争端的另一种思考》重点介绍了解决国家间领土主权纷争的另一种选择:即争议领土公地化。它既适用于地球特殊

[1] 刘新华:《中国发展海权的战略选择——基于战略管理的SWOT分析视角》,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10期。

[2] 左希迎:《中国在钓鱼岛争端中的战略动员》,载《外交评论》2014年第2期。

空间，也涉及一般化的国家间领土主权争议。^[1]曲波则从条约视角出发，认为虽然没有条约明确规定钓鱼岛的主权归属，但从条约解释的角度可以证明中国对钓鱼岛拥有主权。^[2]

核安全是关乎人类命运的重要外交议题，学界在此领域的探讨也从未停止。吴苑思的《核安全峰会、全球核秩序建设与中国角色》在分析了以美国为主导的现有核安全管理机制陷入窘境的现状后，提出了中国应在全球和地区的核秩序建设中做出更大贡献。^[3]樊吉社在《核安全全球治理：历史、现实与挑战》一文中认为：核安全的治理必然是全球治理，在分析冷战时期、冷战后初期及“9·11”事件后的核安全治理措施的同时，也提出了值得改进的问题。^[4]

学界还对非传统安全这一复杂外交议题进行了研究。余潇枫认为，非传统安全的价值实质是“共享安全”。近年来，中国为共享安全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内核与独特的价值坐标，极具创意的可能性论证及无可辩驳的现实逻辑。^[5]李志斐提出，非传统安全问题为大国间新型关系的构建创造了机遇，大国间合作开展非传统安全治理成为构筑新型关系的重要增长点。非传统安全治理和新型大国关系构建之间是一种相互促进的良性互动关系。^[6]刘跃进则总结了我国官方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至今的非传统安全观的历史演进。^[7]

[1] 杨昊、蔡拓：《公地化：解决领土主权争端的另一种思考》，载《国际安全研究》2013年第3期。

[2] 曲波：《条约视角下钓鱼岛主权归属探究》，载《当代中国史研究》2013年第5期。

[3] 吴苑思：《核安全峰会、全球核秩序建设与中国角色》，载《国际安全研究》2015年第2期。

[4] 樊吉社：《核安全全球治理：历史、现实与挑战》，载《国际安全研究》2015年第2期。

[5] 余潇枫：《共享安全：非传统安全研究的中国视域》，载《国际安全研究》2014年第1期。

[6] 李志斐：《非传统安全治理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载《教学与研究》2014年第6期。

[7] 刘跃进：《中国官方非传统安全观的历史演进与逻辑构成》，载《国际安全研究》2014年第2期。

中国周边区域合作依旧是中国学界的研究重点。学者们结合中国周边国际局势的新变化,在此研究议题上提出了新的建设性思路。姚遥的《推进周边公共外交:理念、问题与对策》说明了周边的公共外交工作承载着重要的理念和任务,并对存在着的一些问题和瓶颈提出了周边公共外交战略增强宏观视野中的“大周边”意识;提倡与周边国家的互助与共塑;凝聚社会公众的资源与共识;致力于中国话语的总结与传播的主要路径。^[1]宋国友在《中国周边经济外交:机制协调与策略选择》一文指出:应重视发挥地方在周边外交中的重要作用,协调不同部委在周边外交经济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关系,处理好政府和市场两大主体的角色,深入思考经济激励和惩罚两种策略的使用。^[2]陈琪、管传靖根据政策调整的主要方面,结合现实问题和有关周边外交政策的争论,重点分析了“亲、诚、容、惠”理念及其相应政策问题,并指出,周边外交工作的重点应偏向争端解决与区域合作等突出的议题。^[3]

(二) 新外交理念和政策的解读及分析

中国政府结合国际形势变化及中国实际情况,提出了新的外交理念和方针,学界随即对其进行了解读与分析,成为近年外交研究的一大亮点。

新型大国关系构建最初是针对中美关系提出的概念。近年来随着中美在亚太地区的战略相遇,新型大国关系亦成为学界高度关注的现实性命题。倪世雄在《漫谈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一文中指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时代使然,已经取得了历史性进展,但还面临着许多新的挑战 and 新的考验,今后中美之间需要“释疑增信,管控分歧”。^[4]袁

[1] 姚遥:《推进周边公共外交:理念、问题与对策》,载《国际问题研究》2014年第6期。

[2] 宋国友:《中国周边经济外交:机制协调与策略选择》,载《国际问题研究》2014年第2期。

[3] 陈琪、管传靖:《中国周边外交的政策调整与新理念》,载《当代亚太》2014年第3期。

[4] 倪世雄:《漫谈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载《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

鹏认为：在中国新一轮改革已然开始的今天，中美关系有了四个根本变化。即实力对比、战略态势、战略基础、决策环境，中美关系的未来应着眼于推动利益共同体、安全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等三个共同体建设。^[1]杨洁勉撰文指出，新型大国关系始于但并不限于中美关系，并从理论建构、战略思考、政策途径对其进行了剖析。^[2]当然，我们也应当注意到，随着新型大国关系适用范围的不断扩大，学界也用此概念分析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王生、罗肖的《构建中俄新型大国关系的基础与路径》认为：中俄关系不仅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密切相关，更关系到中国能否真正崛起。作者提出了目前中俄关系存在的两国实力差距拉大、大国制衡、“政热经冷”等问题，并提出了相关解决路径。^[3]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的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简称“一带一路”）重大倡议，成为学界研究的重点。刘江永认为，可持续安全的“海陆和合论”与共建“一带一路”的国际合作实践，必将打破传统地缘政治学所导致的“海陆对抗”或“欧亚大陆地缘争夺”的恶性循环。^[4]金陵的《“一带一路”：中国的马歇尔计划？》针对将该倡议与“马歇尔计划”类比的提法对二者进行了透彻分析，辨明了两者的区别与相似之处；并指出不应将二者列于对立层面，而应从马歇尔计划中吸取“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5]

“新型国际关系”是2014年底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外交理念，并在次年9月28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70

[1] 袁鹏：《中国新一轮改革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载《现代国际关系》2014年第11期。

[2] 杨洁勉：《新型大国关系：理论、战略和政策建构》，载《国际问题研究》2013年第1期。

[3] 王生、罗肖：《构建中俄新型大国关系的基础与路径》，载《现代国际关系》2013年第7期。

[4] 刘江永：《海陆和合论：“一带一路”可持续安全的地缘政治学》，载《国际安全研究》2015年第5期。

[5] 金陵：《“一带一路”：中国的马歇尔计划？》，载《国际问题研究》2015年第1期。

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发表演讲，全面阐述了这一理念。阮宗泽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超越历史赢得未来》中从经略新型周边关系、构架新型大国关系、坚持正确义利观、结伴不结盟、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五个方面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下了定义；进而对该理念的历史背景、优势、所面临的挑战等问题进行了分析与解释。^[1]邢丽菊通过中国传统文化分析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坚持走自己的道路、和平发展、利益观正确、命运共同体）；以传统文化视角解读了新时期中国外交思想的关联性、包容性、和合性及整体性；最后提出中国外交应向世界提供有益的公共产品。^[2]

（三）对外关系研究新议题的效果评估

近年来，学界对于对外关系研究新议题的问题认识和效果评估进行的还不够充分。相信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学界会对新议题有更为深入的把握，并能结合实践经验对其做出评估，提出建议。吴心伯认为，中美两国合作的领域扩大，尽管两国之间仍然存在诸多分歧和摩擦，但双方均能以非对抗性方式处理。为推动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进程，中国应提倡中美在亚太互动中要有创新思维与行动，提出中方之亚太愿景，尝试制定共同的行为准则，设立发展新型大国关系试验项目。^[3]郭震远指出，中美之间正在形成新的重大共同利益。虽然美国仍将继续在台湾问题上施加影响，台湾问题对中美关系的干扰也将继续存在；但总体来看其影响将逐渐减弱，其对中美发展新型大国关系的干扰是有限的、可控的。^[4]

[1] 阮宗泽：《构建新型国际关系：超越历史赢得未来》，载《国际问题研究》2015年第2期。

[2] 邢丽菊：《新时期中国外交思想的传统文化内涵》，载《国际问题研究》2015年第3期。

[3] 吴心伯：《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评估与建议》，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

[4] 郭震远：《台湾问题对中美发展新型大国关系的影响》，载《国际问题研究》2013年第5期。

四、突破与展望：跨学科研究成新热点及趋势

（一）国际关系研究中的跨学科理论解释

随着国际关系研究的不断深入以及国际关系发展的日趋复杂化，需要不断引入、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知识，丰富国际关系研究的手段和方法，弥补国际关系学科自身的理论缺陷。

中国学者在跨学科研究方面取得了如下成果。孙吉胜在《跨学科视域下的国际政治语言学：方向与议程》一文中总结了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建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后建构主义等“后”理论；针对语言学的研究成果，指出国际政治语言学可以围绕语言在学理和政策层面继续深入。^[1]涂晓艳认为由于传染病具有突发、多变及后果严重等特征；同时，安全的概念也不是静止的；因此，对传染病与安全问题的考察需要立足于动态和战略高度。^[2]王存刚等的《大数据与中国外交决策机制创新——基于组织决策理论的视角》在组织决策理论视角下结合“大数据”具有的物质、技术和思维三大维度，对未来中国外交决策机制提出了建议。^[3]

（二）国际关系中网络空间的竞争与合作

随着信息技术及互联网的深入发展，全世界都对网络空间给予高度关注，甚至有学者提出了国家网络主权的概念。网络空间已经成为行为体展开竞争与合作的又一平台。

蔡翠红在《美国网络空间先发制人战略的构建及其影响》一文中，分析了美国业已形成的在网络空间先发制人的战略特点，并指出这使得

[1] 孙吉胜：《跨学科视域下的国际政治语言学：方向与议程》，载《外交评论》2013年第1期。

[2] 涂晓艳：《传染病与安全研究的现状与思考》，载《国际政治研究》2013年第4期。

[3] 王存刚：《大数据与中国外交决策机制创新——基于组织决策理论的视角》，载《外交评论》2015年第4期。

美国的收益与风险参半，并导致了中美在网络空间的安全困境。^[1] 檀有志认为，中美双方应通过不同路径降低虚拟世界中真实意图的不确定性，化解困扰双方的结构性矛盾。^[2] 鲁传颖则分析了各国在网络能力各异的情况下如何完成规范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的网络行为、分配网络资源和塑造网络权力等焦点议题。^[3] 方兴东等人在《棱镜门事件与全球网络空间安全战略研究》一文中深入探析全球网络空间新格局；在网络空间的全新范式下思考中国网络安全战略问题。^[4] 沈逸撰文介绍了两种不同的网络安全战略，并指出其存在长期的竞争性。^[5]

通过以上介绍我们不难看出，中国学者对网络空间安全相关问题已经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研究。其主要着眼点在于：1. 中国在网络空间上的问题应对、战略选择、制度建设等问题。2. 美国对于网络空间的利用及引发的一系列事件。3. 网络空间与全球治理的议题及其关联性研究。这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世界各国在网络空间利用上实力不均衡的现状。我们应当注意到，中国在网络空间维度的发展正日益受到国家在战略上的重视，同时也应该明显感觉到中国在此领域受到的限制与威胁，尤其是中国的网络安全战略关系到中国未来国际地位及国家利益安全。学界对于国际关系中网络空间的竞争与合作的研究应当更加注重跨学科知识的综合运用。

（三）全球治理的合作机制及制度化建设

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的不断加深，全球治理已经成为决定人类未来

[1] 蔡翠红：《美国网络空间先发制人战略的构建及其影响》，载《国际问题研究》2014年第1期。

[2] 檀有志：《跨越“修昔底德陷阱”：中美在网络空间的竞争与合作》，载《外交评论》2014年第5期。

[3] 鲁传颖：《试析当前网络空间全球治理困境》，载《现代国际关系》2013年第11期。

[4] 方兴东等：《棱镜门事件与全球网络空间安全战略研究》，载《现代传播》2014年第1期。

[5] 沈逸：《以实力保安全，还是以治理谋安全？——两种网络安全战略与中国的战略选择》，载《外交评论》2013年第3期。

命运的重要课题，成为全人类关注的焦点。近年来，中国学者围绕全球治理的合作机制及制度化建设所进行的研究主要分成三类：一类是关于全球治理机制及制度化建设本身及相关理论的研究；第二类是对中国应如何参与全球治理合作机制及制度化建设的研究；第三类则是通过对外国有关政策的研究试图得出一些启发性结论。

关于全球治理机制及制度化建设本身及相关理论的研究，^[1]王明国的《全球治理机制复杂性的探索与启示》从复杂性这一全球治理的新兴领域入手，针对其造成的多重治理安排及其重叠状态提出了解决方法。^[2]高奇琦的《试论全球治理的国家自理机制》以民族、国家为主要研究对象，提出了国际自理机制同样会在全球治理的过程中发挥极大作用。^[3]张胜军的《全球深度治理的目标与前景》探讨了全球深度治理的理论依据和变革的现实性、可能性，区分了方法论国家主义与规范国家主义、责任主权与相互性责任主权、国际机制与跨国机制的不同含义；指出和讨论了未来全球深度治理的新机制和新议程。^[4]饶志华、于春洋的《世界政府的限度与全球治理的可能性》通过将世界政府同全球治理结合分析，指出了影响其可行性的诸多问题。^[5]

对于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机制及制度化建设，中国学者有如下成果：李东燕在其《全球安全治理与中国的选择》中阐述了自己对现有全球安

[1] 关于全球治理机制及制度化建设本身及相关理论的研究论文有：陈伟光，《全球治理与全球经济治理若干问题的思考》，载《教学与研究》2014年第2期；汤伟，《世界城市与全球治理的逻辑构建及其意义》，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6期；刘志云，《论全球治理与国际法》，载《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陈喜峰，《宪政的国际法：全球治理的宪政转向》，载《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等等。

[2] 王明国：《全球治理机制复杂性的探索与启示》，载《国外社会科学》2013年第5期。

[3] 高奇琦：《试论全球治理的国家自理机制》，载《学习与探索》2014年第10期。

[4] 张胜军：《全球深度治理的目标与前景》，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4期。

[5] 饶志华、于春洋：《世界政府的限度与全球治理的可能性》，载《江西社会科学》2014年第11期。

全治理概念、框架及特征的认识与理解,提出了中国扩大参与全球安全治理的必要性与可能性选择。^[1]石之瑜等的《宣扬自我责任:全球治理的中国风格》指出中国以被动式的、问题解决导向式的参与全球治理已经不合时宜。^[2]唐国强的《北极问题与中国的政策》分析了北极地区国家在地区事务中既合作又竞争,对其他地区国家的参与心存顾忌的现状 & 中国所采取的相关政策。^[3]

就外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合作机制及制度化建设,吴志成、赵圆圆认为,英国通过灵活务实地参与全球治理,获得了超出其现实实力的国际影响。^[4]金玲则介绍了欧盟在重新自我定位后提出的重视价值观与现实利益的平衡,重视多边主义的“有效性”、“功能性”和“互惠性”维度的全球治理新思路及其影响。^[5]简军波分析了欧盟与联合国在全球治理上存在的诸多矛盾,并指出这一冲突性依赖合作仍将持续。^[6]

纵观上述研究,不难看出以下几点:1. 学界对于全球治理的合作机制及制度化建设所存在的问题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国际秩序、国际法等领域的变化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并结合相关领域知识进行了较为细致的分析。2. 学界认为全球治理的合作机制及制度化建设从各个方面对中国而言是机遇也是挑战,中国必须对此采取积极的态度加以应对。为此,学者们也在各自领域对中国参与其中的命题建言献策。3. 世界其他国家、组织已经开始对全球治理的合作机制及制度化建设进行了新的战略调整,有些已经有所收获,值得中国从中汲取经验教训。值得关注的是,

[1] 李东燕:《全球安全治理与中国的选择》,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4期。

[2] 石之瑜等:《宣扬自我责任:全球治理的中国风格》,载《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

[3] 唐国强:《北极问题与中国的政策》,载《国际问题研究》2013年第1期。

[4] 吴志成、赵圆圆:《英国参与全球治理分析》,载《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

[5] 金玲:《欧盟全球治理新思路及对中欧关系的影响》,载《国际问题研究》2013年第2期。

[6] 简军波:《欧盟参与联合国全球治理——基于“冲突性依赖”的合作》,载《欧洲研究》2013年第2期。

在全球治理的合作机制及制度化建设研究中,学界对较多的关注的领域有二:一是金砖国家在全球治理的合作机制及制度化建设研究中的作用分析;二是中国参与北极治理的相关研究。

(四) 国际法、能源和环境等视阈中的国际政治分析

冷战结束之后,国际环境一直处在深刻而复杂的变化过程之中,从而引发了国际政治分析视阈的扩展。首先,随着国际组织的不断完善及和平理念发展深入人心,行为体之间矛盾的解决已不再仅仅诉诸于武力,而更多依靠国际法来加以解决。其次,在人类工业化水平不断提升的同时,人们也愈加认识到能源在国际政治中的巨大作用。与此同时,环境作为全人类所共同面对的问题,也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

近年来,学界主要在国际争端尤其是与中国国家利益密切相关的海洋争端等研究中引入国际法视阈。如:鲍林娟从国际法的视角出发,认为,正是因为美国一再违反国际法条约、不履行所承担的国际法义务的行为,才造成了中日钓鱼岛争端的现状。^[1]金永明结合日本针对钓鱼岛列岛问题的主张,重点依据国际法分析其主张的错误性和违法性。^[2]海民、张爱朱则以国际法中有关半闭海互相合作的义务规定为出发点,分析了南海合作的现状及发展趋势。^[3]

学界在探讨与气候相关的国际政治问题时多采用环境视阈。王联合在《中美应对气候变化合作:共识、影响与问题》一文中以气候变化合作为主题,在强调中美两国环境方面的合作极具全球意义的同时,也指出了中美两国在气候变化合作方面存在的问题和进一步合作的可能。^[4]许琳、陈迎运用多维权力观分析框架,分析当前主要国家及国家集团构

[1] 鲍林娟:《从国际法的角度看中日钓鱼岛争端中的美国因素》,载《社会主义研究》2015年第2期。

[2] 金永明:《钓鱼岛主权若干国际法问题研究》,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4年第2期。

[3] 海民、张爱朱:《国际法框架下的南海合作》,载《国际问题研究》2014年第1期。

[4] 王联合:《中美应对气候变化合作:共识、影响与问题》,载《国际问题研究》2015年第1期。

成的政治力量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地位及其变化。^[1]姚荣将国际气候政策转移分为学习型政策转移、强制型政策转移以及道义型政策转移三种类型加以分析,并提出了中国的应对策略。^[2]张海滨则提出,气候变化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影响是广泛的,未来的影响将继续增大。为此,应将其置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框架下统筹规划。^[3]

学界对于国际政治中能源问题的探究,近年来主要以中国能源安全及能源合作为主。徐斌的《市场失灵、机制设计与全球能源治理》以能源领域的市场失灵为切入点,分析了当前能源机制的不足,提出了对未来改革和中国参与其中的展望。^[4]徐铭辰在其《能源需求与中国能源外交的三层空间》一文中针对全球能源资源分配、能源通道安全和贸易、能源需求调控三层空间,分析中国能源外交可能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并进一步提出相关对策建议。^[5]

结 语

近年来,中国的国际关系与国际政治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研究中,学界既重视了基础理论研究,也重视现实应用及对策研究,将两者充分结合起来,实现了两者的辩证统一。近年来中国的国际关系与国际政治研究有以下“四新”趋向:

[1] 许琳、陈迎:《全球气候治理与中国的战略选择》,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1期。

[2] 姚荣:《全球环境治理视域下国际气候政策转移的影响与应对策略》,载《生态经济》2013年第6期。

[3] 张海滨:《气候变化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影响——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视角》,载《国际政治研究》2015年第4期。

[4] 徐斌:《市场失灵、机制设计与全球能源治理》,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11期。

[5] 徐铭辰:《能源需求与中国能源外交的三层空间》,载《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

第一,新的中国化的国际关系与国际政治研究路径与范式已经提出、并得到了应用与深化,中国的丰富而灿烂的传统文化思想已经逐渐融入到国际关系与国际政治研究之中,必将为国际关系与政治研究注入新的活力,提供新的可能,进而解决西方文明背景下形成的当今研究范式与路径无法充分诠释的问题。

第二,新的国际政治战略命题研究已经全面展开,国际关系与国际政治研究不仅在传统战略命题研究上得到不断深入反思;更紧跟时代发展趋势,紧盯世界局势变化,紧抓别国战略动态,紧贴中国战略实际,不断丰富、拓展战略命题研究议题,为提升中国国家战略的合理性、适时性及在战略中与其他国家实现良好互动提供智力支持。

第三,新的研究视角及议题拓展已然在外交研究中发展、深化。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壮大及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世界对于中国在各个方面的应当发挥更大作用的呼声日益高涨;与此同时必然也存在一些不解与怀疑。新的研究视角将为中国外交的展开提供更为多元化可能,新的议题拓展将使中国外交拥有更为广阔的空间,新政策的研究解读将有助于中国外交政策得到相关国家的理解与支持。

第四,新的研究热点与趋势正在逐步形成。跨学科研究是国际关系与国际政治研究在面对日趋复杂而多元国际问题时的自我认知完善与合理破解能力的有效增强;是学科确保自身解决、分析问题能力可持续发展的保障,也是学科发展的不竭动力与源泉。中国的国际关系与国际政治研究势必将日趋活跃,使中国与世界在处理相互关系、解决共同问题时可以拥有更多的中华文明的要素与智慧。

[收稿日期 :2016-09-23]

and working out specific diplomatic tactics to expand its strategic interests and influence in the peripheral regions and show its determination and confidence of becoming a major country of the world. This paper has dwelled on exploring the logic development of India's cognition of its peripheral regions, and the ideological basis and basic tactics of India's peripheral diplomacy so as to provide an initial picture of India's peripheral diplomacy.

82 **6. Ethnic Conflicts and the Refugee Issue in Northern Myanma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na's Frontier Governance,**

by Dr. Zhong Guifeng, Assistant Research Fellow from the Center for South Asian Studies and Lecturer from the School of History-Culture and Tourism, Gannan Normal University. The ethnic conflicts in northern Myanmar and the refugee issue caused by it have profoundly affected the security, stability and development of China's southwest frontier, posing new difficulties and challenges to China's frontier governance. As a result, a discuss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na's frontier governance, of the cause of frequent ethnic conflicts, their multi-dimensional impacts on China's frontier, China's path choice to cope with the ethnic conflicts in northern Myanmar, and how to combine frontier governance with diplomatic practice, will benefit not only China's frontier governance, but also China's proper management of China-Myanmar relationship under new circumstances.

94 **7. New Trends of China'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Studies,**

by Lv Yaodong, Professor from the Graduate School of CASS and Xie Ruochu, Doctoral Student from the Graduate School of CASS. With China's participation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 strengthening,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studies in China have called for releva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tudies, while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wishes to hear China's voice. As a result, China has the responsibility and self-confidence to propose its own ideas and conception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studies. China has not only mastered the methodologies and relevant theories of the West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studies, but also put them into practice with some further extensions. Meanwhile, China is trying to make its voice heard in academic exploration in the fields of the sinicization, the mode and path finding, the creation of core concepts, innovation and theoretical breakthroughs as well as expansion in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studies, from the new perspectives and new mode of thinking, and by combining China's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traditions with the practic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recent history. In addition, China has made significant academic achievements in basic theories, practical application and policy studies.